

南華大學

財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NAN HUA UNIVERSITY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研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TERMINANTS OF TAX AND
EARNING MANAGEMENT

指導教授：徐清俊 博士

ADVISOR: PH.D. CHING-JUN HSU

共同指導教授：白宗民 博士

CO-ADVISOR: PH.D. TZUNG-MIN PAI

研究生：王振文

GRADUATE STUDENT: CHEN-WEN WANG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南 華 大 學

財務管理研究所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研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TERMINANTS OF TAX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研究生： 王振文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_____

徐清俊

張端真

施孟隆

指導教授： 徐清俊 白宗民

系主任(所長)： 邱魏順正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九十七年 五 月 廿五 日

謝辭

在職進修的生涯即將劃上休止符，回想這兩年來工作、家庭及學校間來回的奔波，過程中的甘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雖說是身心俱疲，但卻留下完美及甜蜜的回憶。

論文順利完成，必須感謝恩師徐清俊博士。徐博士學識淵博，在論文研究的過程中，不斷地循循善誘，提供許多思考方向與思維指點，使我嚴謹的學習到治學的方法並且得以突破每一個學習的瓶頸。感謝所長邱魏頌正博士、口試委員施孟隆博士及張瑞真博士，細心的閱讀論文，提供專業的指正和寶貴的意見，使得本篇論文更臻完備。

工作順利才能兼顧學業，感謝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第三股同仁給予振文的支持，感謝鄰居的同仁憶芳、妍君及平日提供工作協助與生活關懷的陳股長太山及營業稅服務區的同仁們。

感謝同窗女玉姐的鼓勵及鞭策，益璋在軟體使用上的協助，女玉姐公子在英文摘要的大力幫忙，感謝益成、勝豐、秀鳳、玉平、麗晏及棋鋒陪我走過論文研究的過程及在課業上的交流研討。

最後僅將本篇論文獻給對我期望最深的爸爸、媽媽及一直無怨無悔、默默付出的愛妻紹萍，沒有你們作為振文的支柱，本篇論文無法如此順利完成。謝謝你們的鼓勵與照顧，謝謝你們的支持與關懷。謝謝！謝謝！

南華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研究

研究生：王振文

指導教授：徐清俊博士

共同指導教授：白宗民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營利事業所得稅與公司盈餘管理是否有關聯性，即管理者是否會為了節稅的動機進行盈餘管理；此外，當公司經理人進行盈餘管理時，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來進行盈餘管理而達到節稅的目的。

本研究針對 1991 年至 1996 年高盈餘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使用 Modified Jones Model 來估計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並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應變數，所得稅費用為自變數，並加入公司規模、未操縱前盈餘及負債比率為控制變數，進行多元迴歸分析，探討所得稅費用對公司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1)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是有關聯性的，當未操縱前盈餘為正時，公司經理人會進行盈餘管理，以降低公司盈餘，達到節稅的效果；(2)管理當局在進行盈餘管理時，以裁決性存貨、裁決性應付票據、異常營業外損益及異常研發支出較為公司經理人使用。

關鍵詞：營利事業所得稅、盈餘管理。

Title of Thesis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terminants of Tax and Earning Management

Name of Institute: Institut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Nan Hua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 June 2007

Degree Conferred: M.B.A.

Name of Student: Cheng-Wen Wang

Advisor: Ph.D. Ching-Jun Hsu

Co- Advisor: Ph.D.Tzung-Min Pai

Abstract

This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ax and corporate earning management, whether and the manager has the motive of tax saving to carry out the earning management, and in addition, when the company managers are managing their earning management, what kinds of tools they will us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ax saving.

The sample data of high surplus listed companies for this research is from 1991 to 1996. We employ the Modified Jones Model to estimate the accruals by taking accruals as dependent variable and income tax expens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Moreover, we consider the company scale, unmanaged earning surplus and debt ratio as control variables and run 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discuss if the income tax expense will affect the accru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terminants of tax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are relevant, and the unmanaged earning surplus, the company managers will be used to reduce the company surplus and attain the tax saving purpose; (2) When the management is doing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ruling of stock, the ruling of notes payable, the abnormal operating profit or loss, abnormal research and the development expenses are more often used as tools by managers to manage their earnings.

Keyword: the determinants of tax, earnings management.

目 錄

謝誌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錄	iv
表目錄	v
圖目錄	v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3
第三節 研究架構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6
第一節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之關聯性相關文獻	6
第二節 盈餘管理的方法及相關文獻	10
第三節 本章小結	21
第三章 研究方法	22
第一節 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	22
第二節 研究假說	23
第三節 研究流程	25
第四節 變數定義與研究方法	27
第五節 預期結果	35
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37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量及相關性檢定	37
第二節 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理之迴歸分析	40
第三節 盈餘管理工具之分析	41
第四節 本章小結	44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47
第一節 結論	47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49
參考文獻	51

表目錄

表 2-1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相關文獻彙總	9
表 2-2 盈餘管理的方法及相關文獻彙總	21
表 4-1 各變數之描述統計值	38
表 4-2 各變數 Pearson 相關係數矩陣	39
表 4-3 各變數的變異數膨脹因素	39
表 4-4 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理行為迴歸實證結果	40
表 4-5 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平均數檢定結果	42
表 4-6 實證結果彙總表	46

圖目錄

圖1-4 論文架構	5
圖3-1 研究流程圖	2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租稅乃政府對人民的一種強制徵收，用以支付公共活動所需的費用，而此種徵收，並無給付特種利益與否的關係存在。因此租稅乃政府為執行公務供應財政需要或實現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之目的，基於人民納稅的義務，依據人民納稅的能力，向人民強制課徵，無個別特殊利益報償的主要收入，而以貨幣表示者。

在我國目前的租稅制度中，將所有的稅目區分為國稅與地方稅。對我國財政而言，國稅的比重遠優於地方稅，而所得稅又優於其他國稅項目。我國現行的所得稅法包含了兩種稅目，分別是個人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所得稅法第一條)，其中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課徵不僅是國家重要的財源收入更兼具國家總體經濟發展及照顧弱勢社會政策的雙重功能，由此可知營利事業所得稅在所有的稅目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營利事業所得稅在我國已實施近 60 年之久，其性質類似其他國家實施之法人所得稅或公司所得稅。我國除對法人或公司課稅外，尚包括獨資、合夥、合作社、其他組織以及不符合行政院規定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體等事業，其範圍較廣。營利事業所得稅課稅範圍為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我國境內者，應就其在國內及境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惟為避免國際間之重複課稅，所得稅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有扣抵稅款之辦法；若營利事業總機構在我國境外(即國外營利事業)，不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如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均應依法向我國納稅(所得稅法第三條)。

上述之規定即為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稅基。整體而言，有所得即應課稅，不過近年來政府為了發展經濟及促進產業升級，訂定相關租稅減免的法規(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二章、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二十八條、促進民間參與建設法第三十六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十八條、企業併購法第三十七條等..)，不但侵蝕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稅基且賦予公司經理人更大的盈餘管理空間(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規定之加速折舊及五年投資抵減規定)；再者公司為避免過度完稅及被加徵稅額，公司經理人會為稅務目的而進行財務會計之層面之盈餘管理，不僅增加公司盈餘管理的動機，更是對國家財政造成影響。上述有關法律層面的租稅減免，由於需符合一定之要件才能享有，故本研究主要為探討公司經理人為稅務目的而進行財務會計之層面之盈餘管理。

歐進士、李佳玲及詹茂昆(2004)認為公司為了達到某一時點一定盈餘或使投資人認為所投資的公司為一穩定成長的健全公司，常會利用各種方法操縱盈餘。當企業營業利益波動大時，為使盈餘平穩企業可能會運用非營業項目平穩盈餘。實證結果發現，在控制企業獲利能力、經營規模與轉投資強度等因素後，我國上市上櫃公司中，經營風險與盈餘管理程度呈顯著正相關；而公司所發佈之財務資訊是否公允可靠，是否有操縱盈餘及操縱盈餘程度的大小，其中重要的影響因素是管理者之盈餘管理。。

江向才及鄭莉(2003)認為盈餘管理將使公司財務報表失去忠實允當表達公司財務狀況、經營成果的目的，進而使投資人、債權人做出偏差的決策。對政府而言，基於樹果原則(Fruit and Tree Doctrine)，以公司盈餘為課稅客體且以一定之比例(目前稅率為25%)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當公司獲利佳時，公司應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亦增加；反之，當公司獲利差時，公司應繳營利事業所得稅就減少。

因此，當公司基於某一定動機而操縱盈餘時，為避免讓外界或政府機關察覺其盈餘管理的意圖，公司經理人通常喜歡以可裁決性的應計項目(林嬋娟及官心怡，1996)

或以研究發展費用(金成隆、林修葳及林憶樺，2000)來當作盈餘管理的工具。故本研究企圖探討當公司經理人為了節稅的動機，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來進行盈餘管理而達到節稅的目的，此為本研究探討的焦點。

此外，我國有關盈餘管理的研究雖有不少，但絕大部分在探討當公司盈餘衰退時或波動過大時如何透過盈餘管理美化公司財務報表或使公司盈餘平穩化，如比較台灣公司IPO之盈餘管理行為、衰退公司盈餘管理、財務困難公司之盈餘管理或股利政策與盈餘管理、盈餘管理與經營風險等，鮮少提到盈餘管理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的關聯性，管理者是否會為了節稅的動機，而透過盈餘管理降低公司的稅前純益，達到節稅的效果，即為本研究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乃是以其當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當公司的所得額增加時，即表示營利事業所得稅增加，營利事業所得稅增加，公司盈餘管理的動機亦增加，那麼公司是否會透過盈餘管理來降低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來達到節稅的目的？故本研究的目的可歸納成下列幾點：

- 1.利用複迴歸分析來探討當高盈餘的公司課稅所得高時，經理人是否會基於節稅的效果，而利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Discretionary Accruals)的操控來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
- 2.公司進行盈餘管理時，會使用各種工具來進行盈餘管理，如應收帳款、應付帳款、存貨、營業外損益、處分固定資產、處分投資、研究發展費用等。故本研究進一步以Modified Jones Model(Dechow, P. M., R. G. Sloan, and A. P. Sweeney,1995)來估計裁

決性應計項目，並利用t檢定及無母數Z檢定來探討企業管理當局到底偏好那些會計科目來進行盈餘管理行為。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共分五章，其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說明本研究之背景、動機與目的，並對研究架構作一概略性描述。

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主要分為二節，第一節介紹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相關規定，第二節介紹盈餘管理的動機及相關文獻。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敘述本研究所使用之假設、研究實證設計與方法、樣本資料來源與方法。

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就所選取的資料，進行統計檢定與分析，檢定是否與假說之預期一致。

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論文架構圖如圖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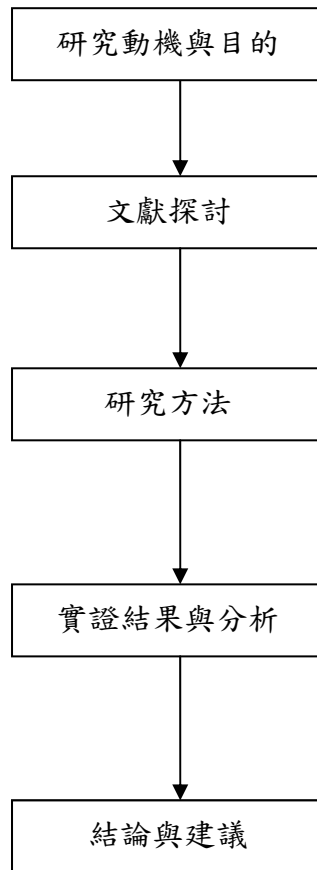


圖 1-1 論文架構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最主要在探討當公司獲利能力變佳時，經理人是否會基於節稅動機而進行盈餘管理。所以本章分為二個部分，第一節探討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之關聯性相關文獻，第二節探討盈餘管理的方法及相關文獻，第三節為文獻探討結論。

第一節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相關文獻

一、國內相關文獻

我國所得稅制自1951年修定所得稅法後，即採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綜合所得稅並行之獨立課稅制度，在該制度下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當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公司課稅所得額(所得稅法第24條)。

巫鑫(1998)認為在兩稅合一制度實施後對中小企業之個人股東而言，其營利所得的邊際稅率由55%降低至40%；但對高科技股東而言，由於其企業本身享有租稅優惠，只是在公司階段少繳稅，但在股東階段與一般中小企業之股東相比並無差異。

陳亭如(2000)探討在兩稅合一制實施後，營利事業所得稅本質上的改變是否為投資人發現，成為投資價值的一部份，並探討稅前盈餘是否較稅後盈餘更能提供具攸關性的資訊品質。其以1997年及1998年為樣本期間，選取該期間內139家上市公司為樣本，並利用簡單敘述量分析、簡單迴歸分析、多元迴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實證結果發現兩稅合一制度實施前，稅後盈餘較稅前盈餘具資訊內涵；實施之後，稅後盈餘成為解釋股票報酬的變數；在實施之前，營利事業所得稅與股票報酬呈負相關，但之後卻呈現正相關。

林世銘、林宗輝及蔡彥卿(2001)探討兩稅合一制的實施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該研究認為，兩稅合一後，採取稅額扣抵制的方式，對於公司有減稅效果，故預期公司會將部份原屬於1997年度之盈餘遞延至1998年度。然而上市公司有股價壓力，未上市公司則無，故預期前述之盈餘管理行為，在未上市上櫃公司身上將更為顯著。其研究結果顯示，不論為上市或未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其在1997年度之裁量性應計數皆為負，而1998、1999年度則不顯著，顯示這些公司為因應兩稅合一之實施，有遞延盈餘之行為，以享稅負上之優惠。

二、國外相關文獻

美國1986年之租稅改革方案(Tax Reform Act, TRA)以兩年的期間(1987—1988)將公司最高所得稅率由46%降低至34%，歷年陸續有許多學者針對降稅前後，公司為謀求租稅利益而產生之盈餘管理行為做研究。

Gramlich(1991)主要探討調整最低所得稅之帳面淨利價值(Alternative Minimum TAX Book Income Adjustment, AMTBIA)對應計項目之影響。該研究係以橫斷面之迴歸式進行分析，研究結果指出在1987年公司顯著減少產生所得之應計項目行為發生，而在1986年則是支持經理人會選擇增加所得的應計項目之假說；另外在1986年及1987年發現交通運輸業、通訊業及金融服務業有較顯著的修正應計項目之行為。

Scholes, Wilson and Wolfson(1992)調查公司是否會藉由遞延收入或加速費用支出來移轉淨利於未來期間，以因應1986年TRA降低稅率的時間表。實證結果顯示，當公司預期稅率降低時，會遞延收益認列與(或)加速費用認列，以操縱淨利，進而達到節省所得稅目的。

Guenter(1994)亦探討在1986年TRA下，所得稅稅率之變動是否提供公司經理人很大的誘因去遞延淨利，以極小化公司之所得稅成本，進而使公司價值最大化；並檢

視公司規模、長期負債水準與經理人持股比重等因素對盈餘操縱行為之影響。結果顯示，公司規模愈大，在稅率降低前之年度向下操作盈餘的現象愈顯著；而公司長期負債水準與應計項目的變動呈現正相關；經理人持股比重與應計項目間則無顯著相關。

Klassen, Lang and Wolfson(1993)以美國 191 家跨國企業為樣本，調查跨國企業是否會作區域性的淨利移轉，以因應 1984-1990 年間世界性的稅率變動。其研究結果發現，1985 年與 1986 年間，由於加拿大的稅率提高與歐洲的稅率降低，美國的跨國企業會將淨利由加拿大移轉至美國，以及由美國移轉至歐洲；1987 年時，美國的稅率降低，且與其他國家的稅率相近，此時樣本公司會將淨利移轉至美國；在 1988 年度，企業將淨利移轉至除了歐洲與加拿大以外的非美國家，可能係因為此時其他國家之稅率降低；最後於 1989 年度，因加拿大所得稅大幅降低，企業會將淨利由非美國加移轉至加拿大。且其淨利移轉的幅度達到統計上與經濟上之顯著水準。

Wang, Shaff and Kochian(1994)研究企業之財務報表與 1986 年最低所得稅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兩者之關係。該研究對先前有關之研究提出三項改善觀點，一是樣本確實僅包含了適用 AMT 之公司，其次是應計費用及收益對 1986 年稅法改變之並不具敏感性，最後是公司財務情況改變之時間序列模型是適用在估計未預期應計項目上。研究結果為 AMT 公司會在 1986 年遞延費用及加速應計收益的認列，而在 1987 年則是加速遞延費用認列及遞延應計收益。Wang 認為所研究的樣本公司在 1986 年確實有增加應計項目之產生。

Lopez, Regier and Lee(1998)探討稅務報導與財務報導之衝突，以發展一變數以增加公司可能從事流動裁決性應計項目以使其稅負極小化的解釋能力。該研究結果指出在所得稅率改變前，稅制積極之公司與負的流動裁決性應計項目有直接相關性。稅制積極公司相對其他公司而言，在稅制改革前有較大的負數流動裁決性應計項目；當公司面對稅制改革時會採取流動裁決性應計項目來進行調整。

由以上的文獻可知，營利所得稅政策對於公司具有關聯性。但不論是國外的學者或國內的學者皆是對於單一事件進行探討，如稅率降低對公司影響、兩稅合一實施後對公司盈餘管理關聯性及兩稅合一實施後是否實質減輕公司稅負等等，並未提到盈餘管理與營利事業所得稅之間的關聯性，故本研究探討管理者是否會為了節稅的動機，藉由操縱盈餘數字來降低課稅盈餘，以進行盈餘管理達到節稅的效果。（參見表 2-1）

表 2-1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相關文獻彙總

研究主題	作者及年份	研究結果
兩稅合一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	巫鑫（1998）、陳亭如（2000）、林世銘、林宗輝及蔡彥卿（2001）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兩稅合一制的實施前後，不論為上市或未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有遞延盈餘之行為，以享稅賦上之優惠。 2.兩稅合一制度實施前，稅後盈餘較稅前盈餘具資訊內涵。 3.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是有關聯性。
公司所得稅是否受稅制變動影響	Scholes, Wilson and Wolfson（1992）、Gramlich（1991）、Guenter（1994）、Wang（1994）、Lopez, Regier and Lee（1998）、Klassen, Lang and Wolfson（1993）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當公司預期稅率降低時，會遞延收益認列與（或）加速費用認列，以操縱淨利，進而達到節省所得稅目的。 2.有較顯著的修正應計項目之行為，規模愈大，在稅率降低前之年度向下操作盈餘的現象愈顯著。 3.在所得稅率改變前，稅制積極之公司與負的流動裁決性應計項目有直接相關性。 4.當稅率變動時，跨國企業會將淨利移轉至稅率較低的地區。 5.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是有關聯性。

第二節 盈餘管理(Earning Management)相關文獻

公司之財務報表和相關的揭露，是外界為了瞭解公司經營績效及預期未來發展最主要的資訊來源與衡量工具。本節主要探討公司之財務報表和相關的揭露是否能真實反應公司營運及財務狀況，及究竟有無盈餘操縱。

一、盈餘管理的意義

Gordon(1963)所提出之盈餘平穩化及 Watts and Zimmerman(1978)所提出的實徵性會計理論概念，皆認為對盈餘管理者而言，因管理人員之目的不同而有三種策略，即使盈餘增加、降低盈餘或使盈餘平穩化。Schipper(1989)則認為盈餘管理為財報提供者基於某種經濟上的動機，利用其對損益承認的自由裁量權而企圖控制盈餘的結果，區分為實質管理(同時影響經濟與會計所得)和人為的盈餘管理(影響會計所得)。

盈餘管理的文獻包括盈餘管理的動機和方法。Healy and Wahlen(1999)指出，須先確定管理者從事盈餘管理的動機，方能確定盈餘是否被操弄。在會計文獻中，學者鄭丁旺(1993)對於盈餘管理所下的定義，主要可歸納為三種：(1)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允許下，對於會計原則與程序之運作，做有目的的調整與改變，使公開的盈餘達到期望水準的一個程序；(2)對於會計處理與財務報表之編制，進行有目的之操縱，企圖增加公司或某些私人利益的作法；(3)公司管理階層對於公司實際財務績效，加以扭曲。

二、盈餘管理的動機

本研究歸納過去學者文獻，依常見的盈餘管理動機來分類探討相關之文獻。

(一) 資本市場的誘因

公司的會計資訊常被投資人及分析師使用於評估該公司之財務狀況或預測股票價

值，因此公司管理當局可能藉由盈餘管理來操縱損益，針對此一之動機，國內外有許多相關之文獻。

Friedlan(1994)及 Teoh, Welch and Wong(1998)探討公司初次公開發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及盈餘管理的議題。由於公司在公開發行前並沒有相關市場價格可評估發行股票的承銷價，所以會計資訊變成為評估承銷價的重要因素之一；且為了通過證管會的審查，公司管理階層可能會美化報表，所以他們研究初次公開發行公司是否會在公開發行前縱損益，使盈餘提高以提高承銷價其研究結果發現，公司在初次公開發行前會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來提高公司盈餘。國內李建然及羅元銘(2002)探討 1984 年至 1996 年間，在台灣證券交易初次上市 IPO 公司，上市前與上市後至第九年經營績效變動之情況，並探討上市後營運績效衰退是否是盈餘管理、代理問題或上市時機的選擇等因素所造成。作者使用淨值報酬率(Returns on Equity)為主要績效目標，再根據杜邦架構(Do Pont System)來進行分析。實證結果顯示，上市後績效衰退的原因，似乎與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上市後的代理問題、盈餘管理或上市時機的選擇均有關係，其中以上市時機影響最大，盈餘管理次之，代理問題最小。

(二) 獎酬計畫

公司與經理人訂立獎酬計畫的目的在於避免經理人員因自身之利益而犧牲股東之權益，此即所謂代理成本。對於獎酬之衡量，通常都會將會計資訊納入考慮，但由於部分會計資訊之衡量牽涉到經理人員主觀的判斷，因此產生經理人員是否會為了取得獎酬而有盈餘操縱行為之疑慮。Healy(1985)認為紅利計畫中通常會有紅利上限和目標盈餘。即：(1)公司未含裁決性應計項目前淨利可獲得的獎酬超過訂定之紅利計畫上限時，經理人會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調降盈餘並將部分當期盈餘遞延至下期已歷次期獎酬之獲得；(2)公司未含裁決性應計項目前淨利可獲得的獎酬高於訂定之紅利計畫下限但未達到上限時，經理人會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提高盈餘使當期獎酬達到最大；(3)公司未含裁決性應計項目前淨利無法達到訂定之紅利計畫最低水準，經理人

會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減少盈餘以增加下期盈餘可達水準的可能性。

(三) 債約動機

債務契約通常包含許多約定以保護債權人權益。實事性會計理論的債約假說預測，經理人會因為債約目的而進行盈餘管理。由於違反債約會產生重大成本，故管理者會極力避免違約，甚至避免接近違約的狀況。DeFond and Jiambalvo(1994)之研究即在探討公司在違反債約的前一個年度與當年度，債約假說是否會影響公司經理人的會計選擇，利用應計項目來操縱盈餘。其研究結果發現，有違反契約的樣本公司在違反條款的前一年度會從事盈餘管理以增加公司盈餘。

(四) 政治動機

獨占性或近似獨占的公司、策略性產業及規模很大的公司，在政治上都是被注意的焦點，因為它們的活動會影響社會大眾。而這樣的公司多希望能藉由盈餘管理來降低被社會大眾注意的焦點。亦即使用會計實務與程序來報導最小化的淨利，特別是在高度繁榮期。否則，大眾的壓力會促使政府增加法規的限制或其他的方式來降低其獲利能力。

相關的研究有 Jones(1991)探討美國政府進口管制保護政策(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而受惠的公司，在美國 ITC 進行調查決定是否繼續管制進口時，是否利用盈餘管理降低盈餘以繼續獲得限制進口之保護。其實證結果發現，於 ITC 調查結果期間，經理人確實曾經利用應計項目的操縱來降低盈餘，意圖使 ITC 同意限制國外產品進口；尤其在 ITC 完成調查的當年度，樣本公司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來盈餘管理的現象最為顯著。其它研究如 Cahan(1992)亦發現其樣本公司曾於 1970 年至 1983 年間受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之獨占調查者，在受調查的年度相較於其他年度，有較多使淨利減少的應計項目。

三、盈餘管理方法的相關文獻

(一) 有關盈餘管理方法的外國文獻

Healy(1985)將總應計項目定義為本期純益(Reported Earnings)與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之差額，再以當期之期末總資產加以平減。Healy 假設非裁決性應計項目不隨時間而改變，也就是在觀察期時，非裁決性項目並不會有所改變，而用總應計項目的變動來衡量裁決性應計項目。Healy 以總應計項目作為裁決性應計項目的代理變數。實證結果顯示：公司紅利計畫的內容會造成經理人不同的盈餘管理行為，其中包括：(1) 公司未含裁決性應計項目前淨利可獲得的獎酬超過訂定之紅利計畫上限時，經理人會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調降盈餘並將部分當期盈餘遞延至下期已歷次期獎酬之獲得；(2) 公司未含裁決性應計項目前淨利可獲得的獎酬高於訂定之紅利計畫下限但未達到上限時，經理人會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提高盈餘使當期獎酬達到最大；(3) 公司未含裁決性應計項目前淨利無法達到訂定之紅利計畫最低水準，經理人會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減少盈餘以增加下期盈餘可達水準的可能性。

Dechow and Sloan(1991)探討 1974 年至 1988 年間，以盈餘做為績效衡量標準之公司，是否在 CEO 任期之最後，為增加短期之獎酬，減少長期性之支出(如：R&D)以增加盈餘。實證結果顯示，在管理者任期屆滿前，會減少其研究發展(R&D)之支出。

Jones(1991)同樣認為非裁決性項目應計項目並不是固定的，且認為非裁決性項目應計項目會受到外部經濟環境變動之改變而變動，因此 Jones 利用公司持有之的預期模式去預測正常應計項目，修正以往隨機漫步的假設。由於收益項目可以客觀衡量公司操縱盈餘前的營運狀況，以收益的變動數作為受經濟環境影響的控制變數，財產廠房及設備之總額則作為非裁決性折舊費用的控制變數，而發展出一套時間序列模型估計總應計項目。Jones 探討美國政府進口管制保護政策 ITC 而受惠的公司，在美國 ITC 進行調查決定是否繼續管制進口時，是否利用盈餘管理降低盈餘以繼續獲得限制進口之保護。其實證結果發現，於 ITC 調查結果期間，經理人確實曾經利用應計項目的操

縱來降低盈餘，意圖使 ITC 同意限制國外產品進口；尤其在 ITC 完成調查的當年度，樣本公司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來盈餘管理的現象最為顯著。

DeAngelo, DeAngelo, and Skinner(1994)探討公司在管理買下(Management Buyout)前，為了要降低購買或取得成本，管理階層可能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調整，影響被管理公司的股票真實市價來達成其取得上的策略。DeAngelo et.al.修正 Healy(1985)所提出之模式，以公司前一期之總應計項目為基準，將其視為正常之總應計項目(Normal Accrual)，來衡量測試時間之總應計項目與正常應計項目之差額，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非常應計項目(Abnormal Accrual)。DeAngelo et.al.並用隨機漫步模式套用在非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計算上。所謂的隨機漫步，即非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變動之期望值等於零，因此總應計項目之變動就等於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變動。實證結果並未發現樣本公司在收購前有調低盈餘的情事發生，分析原因可能由於公司下市時均會委請專家評估公司真實價，而減少操縱的動機。但此模式仍在某些地方有其缺陷，如 Aharony, Lin and Loeb (1993)認為某些產業的新上市公司，處於整體大環境成長的階段，將影響總應計項目。此部分的變動可能是導因於公司成長而造成非裁決性應計項目之變動，並非全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變動所造成的。且預期之總應計項目僅受前一期資料影響，可能造成模型之偏誤。

另一方面，由於在 Jones model 中未考慮到收益包含現銷與賒銷兩部份，而經理人可利用賒銷的認列時點來進行盈餘管理的操縱，例如：公司經理人可能再尚未收到現金時，不論該筆收益是否已賺得，即利用裁量權提早於期末認列該筆收益，如此將使收益與總應計項目均提高了，若存在此種情形將降低銷貨的變動對非裁決性應計項目的解釋能力。有鑑於此，Dechow, Sloan and Sweeney(1995)對 Jones model 做了進一步修正，假設事件期中所有賒銷的變動均來自於盈餘操縱的結果，Dechow, Sloan and Sweeney 加入了應收帳款的變動；換句話說，也就是在事件期「非裁決性應計項目」的估計式中，排除所有賒銷變動部分，即營收的變動數減除應收帳款及票據變動數的

部分後就完全屬於現銷的部份，亦即非裁決性收益的部份。

此外，Dechow, Sloan and Sweeney(1995)亦探討各模型對於偵測公司盈餘管理的能力，作者認為各模型在分析管理當局的盈餘管理行為時，經常是將焦點集中在探討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上，如研究者會用一項估計模型，並以既有的盈餘報導資訊來估計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金額大小。此研究以兩個部份來探討各模型在偵測盈餘管理行為時的能力，包括利用統計中檢定適合性部分，來評估所選出的各模型會犯型一錯誤(type I error)的次數，並加上各模型會產生型二錯誤(type II error)的次數，以此兩者為觀察對象，來比較各模型的檢定力。最後測試結果發現，模型中在各方面的表現以Dechow,Sloan and Sweeney 在該研究中所提出的 Modified Jones Model 表現較其他模型為佳。

(二) 盈餘管理方法本國文獻

鄭丁旺(1993)探討新上市公司是否利用應計項目的方式來操縱損益。作者採取簡單平均估計的方式，以上市後三年內應計項目之平均值當作預期值，測試上市前三年之平均值與預期值間是否有顯著之差異。實證結果顯示，對所有樣本而言，新上市公司於上市前後年度之應計項目的確存有顯著之差異。

黃惠君(1995)探討公司上市前後盈餘操縱、上市後盈餘績效及盈餘操縱動機之關聯性，研究企業經理人在遭受巨大上市利益誘導下，是否會於上市前操縱盈餘以利上市並提高承銷價；及上市後是否會利用投資人預期上市後短期內股價會上漲的心態而進行盈餘操縱，以使股價獲得最大的利益。作者採用 Jones(1991)模式來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以檢測公司操縱盈餘的程度，而以淨利與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之變動作為營運績效的衡量指標。而實證結果顯示，公司上市前並未顯著以裁決性應計項目操縱盈餘，但上市當年及上市後第一年則有顯著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提高盈餘之行為。

林嬋娟、洪櫻芬及薛敏正(1997)探討財務困難公司之盈餘管理，指出財務困難也就是盈餘不佳可能造成股價下滑及政府管制，因此可能藉由盈餘操縱提高盈餘。實證結果顯示：財務困難公司裁決性應收帳款、裁決性存貨及異常營業外收入項目中均顯示經理人存在操縱盈餘增加之現象；且根據檢測結果也發現，財務困難公司操縱盈餘的時點，早在變更交易前5年已經開始。不過此文只針對個別應計項目做盈餘管理之檢定，對總應計項目做盈餘管理之檢定，對總應計項目未作整體檢測。

邱淑萍(2003)探討盈餘衰退公司盈餘的管理決策，以台灣股票市場公開交易之上市上櫃公司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包括：(1)盈餘衰退因素：將盈餘衰退公司分為三種，並用裁決性項目對其作測試，發現三種盈餘衰退公司對於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之程度皆有顯著之正向影響，並且在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進行盈餘管理決策時，得到盈餘衰退一年之樣本公司使用裁決性項目機率最高的結果；(2)公司規模：利用兩個模型來檢測盈餘衰退公司盈餘管理之機率，發現企業規模愈大愈有可能藉由裁決性應計項目來操縱盈餘；(3)公司借款依存度：發現盈餘衰退之上市上櫃公司進行盈餘管理之決策與程度，並不會因公司之舉債程度高低而有所差異；(4)管理當局持股比、管理者財富與公司價值連結度：管理者持股比例愈高時，基於自利動機將促使管理當局在盈餘衰退時，大幅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以美化財報，增加個人利益。

陳怡君(2003)以1997年至2000年上市上櫃公司篩選出本研究所定義之三階段財務危機公司作為樣本公司進行驗證。研究結果顯示：危機三階段公司在財務危機發生前後，管理當局會隨著財務危機的嚴重程度來決定該如何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調整盈餘。而管理者所偏好採用之盈餘管理工具則包含：裁決性應計項目、裁決性R&D支出、裁決性廣告費支出、裁決性處分長期資產利得、關係人銷貨、薪水水準增加率。其研究結果亦顯示，在裁決性廣告費支出及裁決性處分長期資產利得的效果並沒有像前述兩項盈餘管理方式那樣的顯著。

楊中航(2004)針對台灣之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並視其有無利用盈餘操縱之手法來進行盈餘管理之行為。首先，運用連檢定來預測中小企業是否普遍存在盈餘管理行為，其次運用時間序列方法逐一觀察各樣本公司其稅後淨利型態以探討中小企業之盈餘管理型態。最後，在研究是否在不同的企業規模下所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的程度會有所不同。研究結果包含：(1)盈餘管理的操作手法普遍存在中小企業；(2)絕大部分台灣中小企業盈餘管理的目的是為了使盈餘平穩化；(3)公司使用裁決性應收帳款來做為平穩化之工具。

四、其他影響盈餘管理方法的相關文獻

國內相關研究如楊朝旭及吳幸蓁(2002)、林嬋娟及林園成(2003)皆提出公司規模、負債比率、去年盈餘是否為正、前期可裁決應計項目、董監事持股比率及法人持股比率等可能影響因子。楊朝旭及吳幸蓁認為公司的規模愈大，為降低政治成本，盈餘管理程度愈低，呈現負相關；負債比率愈高，盈餘管理的誘因則愈大，呈現正相關；此外，由於應計項目存在自我迴歸的特性，前期應計項目可能於本期迴轉，故兩者呈現負相關；董監事持股比率，愈能有效限制經理人盈餘管理的行為，兩者呈現負相關；而若去年盈餘為正數，經理人為避免今年盈餘為負數，盈餘管理的程度亦較大；另外，法人持股比率亦被認為可能影響盈餘管理的因素之一。但以往文獻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有人主張法人持股造成經理人有達成短期獲利目標的壓力，操縱的動機較強，兩者呈現正相關 (Porter,2001)；而另一個觀點認為，法人相對於個人投資者而言，取得資訊的能力較強，因此不會受到盈餘管理的愚弄，故兩者呈現負相關(Bushee,1998)。

五、盈餘管理工具的相關文獻

管理階層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容許之範圍，運用會計原則之可選擇性，在特定之時機及動機之下介入財務報表之報導，以獲取私有利益之行為，因為 GAAP 是被允許有彈性的選擇，因而管理者有機會去選擇會計方法，亦即運用計算會計數字之方法改變，引起盈餘數字之變動，導致同一交易事實，有不同財務報導結果之選擇(李儒

哲, 1999)。常見盈餘管理工具可區分為：(1)與營業有關之可裁決性應計項目與會計方法之選擇；(2)交易時點之控制；(3)運用營業外之項目；(4)創造性合併會計；(5)改頭換面 (Big Bath)。

(一) 與營業有關之可裁決性應計項目與會計方法之選擇

會計盈餘之基礎有現金基礎與應計基礎，而一般公司常用的是應計基礎。應計基礎中的應計項目可分為非裁決性及可裁決性，非裁決性隨企業的營運而變動，並非管理者能變動，而可裁決性則可由管理者自由裁決，進而操縱盈餘。

Watts and Zimmerman(1978)研究企業以存貨會計方法、折舊方法、投資抵減認列方法及退休金分攤年限的選擇，加以檢定紅利假說及規模假說，作者並假設前述每一會計原則的選擇是相互獨立的。其研究結果顯示折舊方法、投資抵減認列方法及退休金分攤年限的選擇符合紅利假說；而存貨會計方法、折舊方法及投資抵減認列方法的選擇則符合規模假說。

國內學者沈維民(1997)認為企業最常利用「會計方法選用」及「裁量性應計基礎的操縱」兩大類盈餘管理工具來進行操縱盈餘，故應同時考慮這兩種可能性，而分開探討。作者進一步以 Logistic 分析，來探討管理當局之盈餘管理是否受到「政治成本」、「紅利計畫」、「債務條款」等三個誘因之影響程度。實證結果顯示，國內企業整體而言，管理當局之損益操縱僅顯著受到「政治成本」之影響，至於「紅利計畫」與「債務條款」等兩項損益操縱誘因之影響力並不顯著。

(二) 交易時點之控制

Bartov(1993)研究公司管理階層是否控制公司長期性資產出售的時點來操縱損益，研究結果顯示管理階層出售長期性資產之行為有做盈餘管理之考量。Don Herrmann(2003)研究日本經理人是否使用固定資產的出售及有價證券來操縱盈餘，研

究結果顯示，當本期營業淨利低於經理人預測值，公司會以出售固定資產及有價證券來使盈餘達到目標值。

金成隆、林修葳及林憶華(2000)以我國上市電子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管理當局是否會使用研發費用來進行盈餘管理。為避免使用時間數列的資料估計每家公司的應計盈餘時，會使樣本數不足致自由度過小，因此作者根據國內情況修正 Berger(1993) 模式採取橫斷面(Cross-Section)方式估計預期的研發費用，接著進行強制性財測 20% 門檻規範的限制對於研究發展費用支出行為的影響檢定。其實證結果顯示，需做強制性財務預測的公司普遍有降低研究發展費用現象，而企業操縱前財務預測誤差與研究發展費用呈負向關係，財務預測高或低的公司，會減少或增加研究發展費用。此外，最接近但未操過門檻這一組的操控幅度，大於未超過門檻的其他各組。其研究結果發現：強制性財務預測公司多為現金增資、公司初次上市，故普遍存在操縱研發費用的現象。

(三) 運用營業外之項目

企業常會運用資金做長短期性之投資或處分其價值較高之固定資產(諸如廠房、土地)，藉以利用其增值利得來充實盈餘數字，並以所取得之價款購入相同之設備管理，在不影響企業正常營運情形下，增加公司的營業外收入來達成盈餘管理的目的。

林明璋(1997)之研究表示，裁決性之營業外損益項目之產生之原因有：(1)為因應資金之需求；(2)大規模公司因會計制度完備，較無法運用自裁性應計項目進行盈餘管理，但有移轉利用裁決性之營業外損益操縱盈餘。

曾國揚(1994)之研究表示，運用營業外損益操縱損益之情形，業績衰退之新上市公司則有顯著大於上市前，表示其上市前運用與營業有關之應計項目及其他工具進行盈餘管理，上市後因而造成業績衰退，但已無法再運用與營業有關之應計項目平穩損

益，應而常運用營業外損益進行操控。所以，對與營業有關之應計項目與營業外損益項目，對於財務報表之揭露及使用者之分析裁決上，有不同之特性及意義，故公司面對外在環境的壓力，在其運用營業外損益盈餘管理策略時亦會有所不同。

馮志卿(1998)以航運公司為例，證實當受金融風暴影響，使其營業外支出增加，諸如投資損失等，促使其增加營業外收入，來彌補其獲利能力之降低。因而裁決性之營業外損益常用來彌補相對營業外損益之非預期之增減，藉以將損益平穩化。

(四) 創造性合併會計

馬嘉應及劉敬業(2000)認為企業會以合併的動作來對盈餘進行操縱，在合併過程中，會將被合併公司之經營成果，一次加以認列，但卻未見到所隱藏的相關費用，企業若想增加盈餘，則可併購一家體質不錯之公司，但若想降低盈餘時，則可併購一家體質不佳之公司，就可以達成預期的目的。

(五) 改頭換面(Big Bath)

馬嘉應及劉敬業(2000)認為管理者藉由重整或變動經營權時，對財務報表作大幅的清潔工作，透過以保守估計之數字，對財務報表之沖銷，或大額損失準備之提列，得以換來未來年度損失之減少認列或轉回利得，用以創造未來之盈餘，另一方面又將原有之鉅額損失之提列及沖銷之責任推由原管理階層負責，藉此方式將公司改頭換面。

綜合本節所載學者大多採用 Modified Jones model(Dechow, Sloan and Sweeney, 1995)來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但從過去與盈餘管理有關之文獻可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未操縱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率。另外，由過去盈餘管理有關之文獻，公司經理人較偏好可裁決性項目、營業外損益及研發費用等工具進行盈餘管理。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綜合本章各節文獻，本研究採用 Modified Jones model(Dechow,Sloan and Sweeney, 1995)來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為避免實證結果受到未操縱前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率的影响而產生偏差，本研究將之納入控制變數，並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應變數，利用複迴歸分析來探討我國上市公司如何透過盈餘管理來達到預期營所稅政策的目的，也就是探討營所稅政策如何的影响盈餘管理。此外，我們也進一步分析公司經理人如何利用可裁決性項目、營業外損益及研發費用等工具進行盈餘管理。(參見表 2-2)

表 2-2 盈餘管理的方法及相關文獻彙總

研究主題	作者及年限	研究結果
盈餘管理的動機	Healy (1985) Dechow,Sloan and Sloan (1991) Jones (1991) Dechow,Sloan and Sweeney (1995) DeAngelo (1994) Aharony (1993)	1.提高公司盈餘。 2.節稅動機。 3.為達公司紅利計畫進行盈餘管理行為，即使盈餘增加、降低盈餘或使盈餘平穩化。
盈餘管理的工具	鄭丁旺 (1993) 黃惠君 (1995) 林嬋娟、洪櫻芬及薛敏正(1995) 邱淑萍 (2003) 陳怡君 (2003) 楊中航 (2004)	公司經理人較偏好可裁決性項目、營業外損益及研發費用等工具進行盈餘管理。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根據公司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理兩者之關聯性，建立研究假說，並據此來衡量變數與選取樣本，進行實證分析。第一節為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第二節為研究假說的建立，第三節為研究流程，第四節為變數定義與研究方法，第五節為預期結果。

第一節 資料來源與樣本選取

一、樣本選取標準

因為所得稅法有 5 年盈虧互抵的規定，而 2007 年度尚未申報完成，故本研究針對 2001 年至 2006 年高盈餘 (2001 年至 2006 每年皆有盈餘且現金股利每年皆大於\$1) 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且樣本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才列入最後分析樣本：

- 1.可取得其完整年度財務資料者。
- 2.金融保險業公司因行業性質特殊及財務結構異於一般產業故排除。
- 3.公司必須採曆年制。公司之會計年度可能不同，但不同之會計年度會造成資料期間不一致，不易使用，故本研究將樣本之會計年度統一。

本研究將台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公司之樣本分類方法如下：若樣本公司課稅所得高即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則歸為操縱組；反之，若樣本公司課稅所得低即未操縱前盈餘低於 0，則歸為對照組；此外，本研究刪除樣本左右兩端各約 1%之極端值。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之上市公司財務資料，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資料頻率為

年資料。

第二節 研究假說

本研究之研究假說分為兩個部份。一為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假說，另一個為盈餘管理工具之假說。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理關聯性假說是針對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政策是否可能成為企業管理當局盈餘管理之誘因為基礎；盈餘管理工具之假說則是針對管理當局各種可能的操縱工具為基礎，建立相關的研究假說。

一、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假說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政策是否成為企業管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的誘因之一。根據 Healy(1985)研究指出，當公司獲利佳時，會基於節稅動機而進行盈餘管理，營利事業所得稅政策為影響企業經理人是否進行盈餘管理的誘因之一。

本研究分別以所得稅費用為營利事業所得稅政策的代理變數，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盈餘管理的代理變數，並進行迴歸分析來探討營利事業所得稅政策是否為影響盈餘管理的因素。而為檢測當公司課稅所得高時(未操縱前盈餘(Unmanaged Earnings)大於 0)，即預期盈餘的金額為正時，企業管理當局會利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來進行盈餘管理，使公司繳納最低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因此發展出假說一如下：

H1：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金額與未操縱盈餘呈正比

此外，當公司的課稅所得愈高時，公司所繳的所得稅愈多，公司管理階層較有可能透過盈餘管理來達到節稅的目的，故發展出假說二如下：

H2：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金額與所得稅費用呈反比

二、盈餘管理工具之假說

會計盈餘的衡量基礎是應計基礎，應計基礎的會計體系中有許多會計選擇，因此提供了經理人員自由裁決的空間與彈性，例如提早認列銷貨、延遲認列費用，或降低認列壞帳費用的比率，以達到增加盈餘的目的(林嬋娟及官心怡，1996)；反之延遲認列銷貨、提早認列費用，或提高認列壞帳費用的比率，即可達到降低盈餘的目的。因此本文建立第三個假說：

H3：公司若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理人可能使用裁決性應收帳款、裁決性應付票據及裁決性存貨降低盈餘。

此外，企業可透過外匯交易損益，利息收入或費用、出售投資損益等營業外損益來進行盈餘管理(管夢欣，1993；Bartov, 1993)，故本研究提出第四個假說如下：

H4：公司若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理人可能使用營業外損益降低盈餘。

再者，研發費用為一種可裁決性支出，其投入與產出間的關係較不明確且未來不確定性高，且比較不會影響到短期間的營運，因此對於研發費用支出比重較高的電子產業，公司經理人可能使用研發費用做為操縱盈餘的工具(金成隆等，2000)。而研發費用在會計上若支出屬當期則可列為當期的費用，更增加公司經理人使用研發費用進行盈餘管理的動機；而研發費用的多寡均取具於經理人的自由裁量，外界很難判定經理人是否有操縱盈餘之意圖，故本文提出第五個假說如下：

H5：公司若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理人可能使用研發費用降低盈餘。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對樣本之各變數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由於本研究樣本資料較大，依據中央極限定理，雖可將樣本資料視為常態分配，但本研究仍同時進行有母數及無母數分析，若有母數及無母數統計結果呈現不一致，則以無母數為主。

在檢測假說一及假說二之前，本研究先測試迴歸式中預期盈餘管理及所得稅費用的自變數之間是否存有共線性。因此本研究先以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即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來檢定。而當自變數有很大的 VIF 值時，即表示有嚴重的共線性。一般而言，當 VIF 值大於 10 時，則有共線之問題。之後，再使用複迴歸分析來對假說一及假說二進行檢定，探討公司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理兩者之關聯性。

在假說三及假說五部份，本研究採兩獨立樣本 t 檢定及無母數(Mann-Whitney)z 檢定等方法來對各項操縱工具進行檢定。本研究擬依據本章第節之樣本分類標準分成操縱組及對照組，然後比照二組間各項操縱工具是否有所差異。本研究之流程圖如

圖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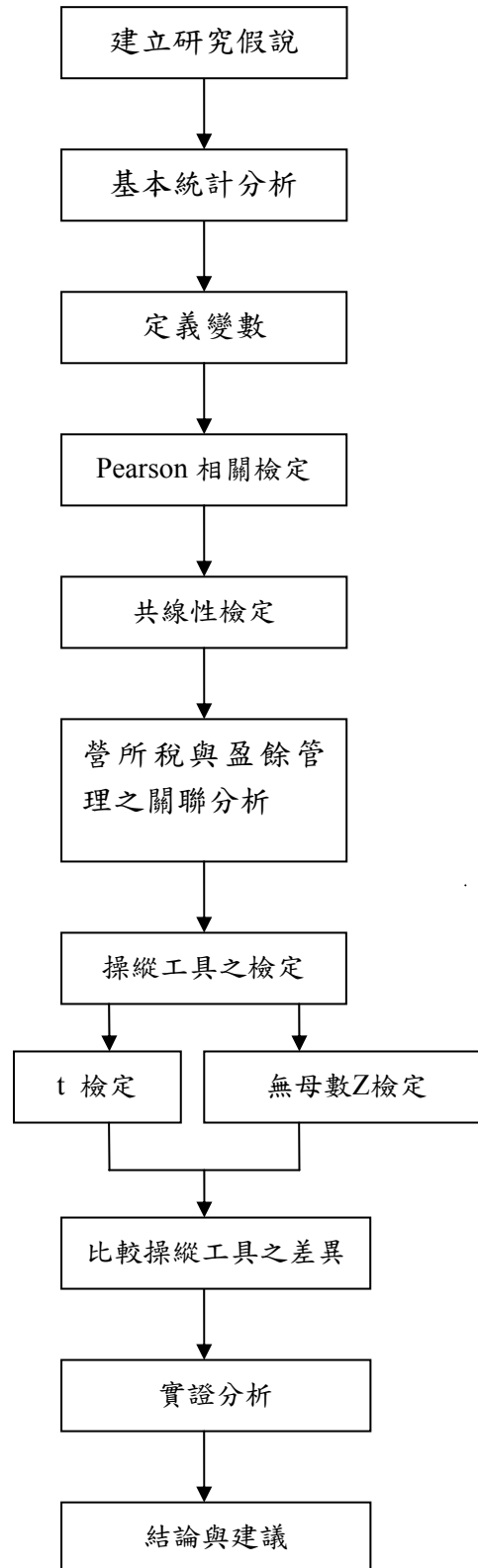


圖 3-1 研究流程圖

第四節 變數定義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 Modified Jones model(Dechow,Sloan and Sweeney, 1995)來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為避免實證結果受到未操縱前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率的影響而產生偏差，本研究將之納入控制變數，並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應變數，利用複迴歸分析來探討我國上市公司如何透過盈餘管理來達到預期營所稅政策的目的，也就是探討營所稅政策如何的影響盈餘管理。此外，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公司經理人如何利用可裁決性項目、營業外損益及研發費用等工具進行盈餘管理。

一、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

本研究將未操縱前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率納入控制變數，並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應變數，利用複迴歸分析來探討我國上市公司如何透過盈餘管理來達到預期營所稅政策的目的，也就是探討營所稅政策如何的影響盈餘管理。

(一) 變數定義

1. 總裁決性應計項目之金額($DAC_{i,t}$)

總應計項目是指企業分別依權責基礎計算所得盈餘之差額，也就是以繼續營業部門淨利減去營業現金流量的差額。本研究使用橫斷面產業別 Modified Jones Model，首先以同年同產業所有公司之資料估計出(3-1)之迴歸係數後，代入式(3-2)中，以同年資料計算出股利發放公司之非裁決性應計項目金額，即可得出可裁決性應計項目，計算如式(3-1)及(3-2)：

$$TAC_{j,t}/A_{j,t-1} = \beta_{0i,t}/A_{j,t-1} + \beta_{1i,t}(\Delta REV_{j,t} - \Delta AR_{j,t})/A_{j,t-1} + \beta_{2i,t}PPE_{j,t}/A_{j,t-1} + \varepsilon_{j,t} \quad (3-1)$$

$$NDAC_{i,t}/A_{i,t-1} = \hat{\beta}_{0i,t}/A_{i,t-1} + \hat{\beta}_{1i,t}(\Delta REV_{i,t} - \Delta AR_{i,t})/A_{i,t-1} + \hat{\beta}_{2i,t}PPE_{i,t}/A_{i,t-1} \quad (3-2)$$

$$DAC_{i,t} = TAC_{i,t} - NDAC_{i,t} \quad (3-3)$$

其中

$A_{j,t-1}$ 為第 $t-1$ 期總資產

$TAC_{j,t}$ (總應計項目) = 經常利益 - 營業活動現金流量

$\Delta REV_{i,t}$ 為營收變動數 = $\Delta REV_{i,t} - \Delta REV_{i,t-1}$

$\Delta AR_{i,t}$ 為應收帳款及票據變動數 = $\Delta AR_{i,t} - \Delta AR_{i,t-1}$

$PPE_{i,t}$ 為折舊性資產總額 = 房屋及建築物成本 - 機器及儀器設備成本 + 其他

設備成本 + 其他設備成本 + 固定資產重估增值

j 為發放股利的 i 公司產業之公司，但 $j \neq i$ ； $DAC_{i,t}$ = 可裁決性應計項目。

$NDAC_{i,t}$ = 為不可裁決應計項目。

$\hat{\beta}_{0i,t}$ 、 $\hat{\beta}_{1i,t}$ 、 $\hat{\beta}_{2i,t}$ 分別為 $\beta_{0i,t}$ 、 $\beta_{1i,t}$ 、 $\beta_{2i,t}$ 之迴歸估計值。

2. 未操縱前盈餘 ($INBD_{i,t}$)

$$\text{未操縱前盈餘}(INBD_{i,t}) = \text{經常利益}(NI_{i,t}) - \text{DAC 裁決性應計項目}(DAC_{i,t}) \quad (3-4)$$

3. 營利事業所得稅費用率 (TAX)

$$\text{營利事業所得稅費用率} = \frac{\text{公司所得稅費用}}{\text{銷貨淨額}} \quad (3-5)$$

4. 公司規模 ($SIZE_{i,t-1}$)

根據過去文獻可知，有很多方法可以用來衡量公司規模，如銷售額及資產總額等做為公司規模之替代變數；而本研究參考大多數文獻以股利發放前一年之銷貨收入 (單位：百萬元) 自然對數值作為控制公司規模的代理變數，其衡量方式如式(3-6)：

$$SIZE_{i,t-1} = \ln(Sales_{i,t-1}) \quad (3-6)$$

其中， $SIZE_{i,t-1}$ 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公司規模； $Sales_{i,t-1}$ 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銷貨收入。

5. 負債比率 ($LEV_{i,t-1}$)

本研究以股利發放前一年之總負債除以總資產來計算負債比率，其計算方式如式 (3-7)：

$$\text{負債比率} = \frac{\text{總負債}}{\text{總資產}} \quad (3-7)$$

(二) 檢定假說一及假說二之實證模型

根據 Dechow, Sloan and Sweeney(1995) 探討各模型對於偵測公司盈餘管理能力結果顯示，各模型中以 Modified Jones Model 表現最佳，故本研究亦採用此模型，模型如式 (3-8) 及 (3-9)：

$$\begin{aligned} TAC_{i,t-n} / A_{i,t-n-1} = & \beta_{0i,t} / A_{i,t-n-1} + \beta_{1i,t} (\Delta REV_{i,t-n} - \Delta AR_{i,t-n}) \\ & / A_{i,t-n-1} + \beta_{2i,t} PPE_{i,t-n} / A_{i,t-n-1} + \varepsilon_{i,t-n} \end{aligned} \quad (3-8)$$

$$\begin{aligned} TAC_{i,t} / A_{i,t-1} = & \beta_{0i,t} / A_{i,t-1} + \beta_{1i,t} (\Delta REV_{i,t-1} - \Delta AR_{i,t-1}) \\ & / A_{i,t-1} + \beta_{2i,t} PPE_{i,t-1} / A_{i,t-1} \end{aligned} \quad (3-9)$$

其中

$TAC_{i,t-n}$ 和 $TAC_{i,t}$ 分別為第 i 家公司第 $t-n$ 年之實際總應計項目和第 t 年之總應計項目。

$n=1,2,3,\dots,T$, T 為估計期間之期間數； $\Delta REV_{i,t-n}$ ($\Delta REV_{i,t}$) 為第 i 家公司第 $t-n(t)$ 年與前一年之收益變動數。

$\Delta AR_{i,t-n}$ ($\Delta AR_{i,t}$) 為第 i 家公司第 $t-n(t)$ 年應收帳款減去第 $t-n-1$ ($t-1$) 年值之應收帳款變動數。

$PPE_{i,t-n}$ ($PPE_{i,t}$) 為第 i 家公司第 $t-n(t)$ 年之財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A_{i,t-n-1}$ ($A_{i,t-1}$) 為第 i 家公司第 $t-n-1(t-1)$ 年之期末總資產； $\beta_{0i,t}$ 、 $\beta_{1i,t}$ 及 $\beta_{2i,t}$ 為迴歸係數值。

其估計值分別為 $\beta^A_{0i,t}$ 、 $\beta^A_{1i,t}$ 、 $\beta^A_{2i,t}$ ； $\varepsilon_{i,t-n}$ 為殘差項。

最後，由第 t 年實際之總應計項目減去算式(3-9)得到之正常總應計項目，即得第 t 年之可裁決性應計項目。

從過去與盈餘管理有關之文獻可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未操縱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率等(楊朝旭及吳幸蓁，2003；林嬋娟及林圍成，2003)，為避免實證結果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偏差，本研究將之納入控制變數，並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應變數，以所得稅費用分別為(3-10)之自變數，進行多元迴歸分析：

$$DAC_{i,t} = \beta_0 + \beta_1 TAX_{i,t} + \beta_2 INBD_{i,t} + \beta_3 SIZE_{i,t-1} + \beta_4 LEV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3-10)$$

其中

i 代表個別公司

β_0 、 β_1 、 β_2 、 β_3 、 β_4 及 β_5 為迴歸係數

DAC = 裁決性應計項目

$INBD$ = 未操縱前盈餘

TAX = 所得稅費用率

$SIZE$ = 公司規模

LEV = 負債比率

$\varepsilon_{i,t}$ 為殘差項

二、個別應計項目

應計項目是由可裁決與不可裁決應計項目所組成，然而不可裁決應計項目非公司管理當局所能控制，因此檢定可裁決性項目的效果應優於總應計項目。然本研究為進一步探討那些個別項目特別為企業經理人所喜愛作為操縱的工具，故特別針對個別的可裁決應計項目進行檢定。

本研究以迴歸模式來估計個別應計項目之變動。首先，本文參考 Stober(1993)之研究模式，使用同產業橫斷面之資料來估算應收帳款、應付帳款及存貨之當年度之估計值，其差額即為可裁決性應收帳款、可裁決性應付帳款及可裁決存貨；其估計的方式如式(3-11)：

1. 應收帳款估計式 ($AR_{i,t}$)

$$\frac{AR_{i,t}}{S_{i,t}} = \beta_0 + \beta_1 \frac{1}{S_{i,t}} + \beta_2 \frac{AR_{i,t-1}}{S_{i,t-1}} + \beta_3 \left[\frac{AR_{i,t-1}}{S_{i,t-1}} - \frac{AR_{i,t-2}}{S_{i,t-2}} \right] + \varepsilon_{i,t} \quad (3-11)$$

其中

$AR_{i,t}$ 為 i 公司第 t 期之應收帳款

$AR_{i,t-1}$ 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應收帳款

$AR_{i,t-2}$ 為 i 公司第 $t-2$ 期之應收帳款

$S_{i,t}$ 為 i 公司第 t 期之銷貨收入

$S_{i,t-1}$ 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銷貨收入

$S_{i,t-2}$ 為 i 公司第 $t-2$ 期之銷貨收入

β_0 、 β_1 、 β_2 及 β_3 為迴歸係數

$\varepsilon_{i,t}$ 為殘差項

2. 存貨估計式($I_{i,t}$)

$$\frac{I_{i,t}}{S_{i,t}} = \beta_0 + \beta_1 \frac{1}{S_{i,t}} + \beta_2 \frac{I_{i,t-1}}{S_{i,t-1}} + \beta_3 \frac{I_{i,t-2}}{S_{i,t-2}} + \beta_4 \left[\frac{I_{i,t-1}}{S_{i,t-1}} - \frac{I_{i,t-2}}{S_{i,t-2}} \right] + \beta_5 \frac{S_{i,t} - S_{i,t-1}}{S_{i,t-1}} + \beta_6 \frac{S_{i,t-1} - S_{i,t-2}}{S_{i,t-2}} + \varepsilon_{i,t} \quad (3-12)$$

其中

$I_{i,t}$ 為 i 公司第 t 期之存貨

$I_{i,t-1}$ 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存貨

$I_{i,t-2}$ 為 i 公司第 $t-2$ 期之存貨

$S_{i,t}$ 為 i 公司第 t 期之銷貨收入

$S_{i,t-1}$ 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銷貨收入

$S_{i,t-2}$ 為 i 公司第 $t-2$ 期之銷貨收入

β_0 、 β_1 、 β_2 、 β_3 、 β_4 、 β_5 及 β_6 為迴歸係數

$\varepsilon_{i,t}$ 為殘差項

3. 應付帳款估計式($AP_{i,t}$)

$$\frac{AP_{i,t}}{S_{i,t}} = \beta_0 + \beta_1 \frac{1}{S_{i,t}} + \beta_2 \frac{AP_{i,t-1}}{S_{i,t-1}} + \beta_3 \left[\frac{AP_{i,t-1}}{S_{i,t-1}} - \frac{AP_{i,t-2}}{S_{i,t-2}} \right] + \varepsilon_{i,t} \quad (3-13)$$

其中

$AP_{i,t}$ 為 i 公司第 t 期之應付帳款

$AP_{i,t-1}$ 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應付帳款

$AP_{i,t-2}$ 為 i 公司第 $t-2$ 期之應付帳款

$S_{i,t}$ 為 i 公司第 t 期之銷貨收入

$S_{i,t-1}$ 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銷貨收入

$S_{i,t-2}$ 為 i 公司第 $t-2$ 期之銷貨收入

β_0 、 β_1 、 β_2 及 β_3 為迴歸係數

$\varepsilon_{i,t}$ 為殘差項

三、異常出售資產損益及營業外損益

在異常出售資產損益及營業外損益，本研究以事件年度上市公司同產業公司之橫斷面平均值做為預期正常水準，再以該公司事件年度實際值減去產業平均值，差額即為異常值。計算式如式(3-15)：

$$E(NOP_{i,t} / A_{i,t-1}) = \sum_{j=1}^n (NOP_{j,t} / A_{j,t-1}) / n \quad (3-14)$$

$$\begin{aligned} UNOP_{i,t} &= NOP_{i,t} - E(NOP_{i,t}) \\ &= NOP_{i,t} - \frac{E(NOP_{i,t} / A_{i,t-1})}{A_{i,t-1}} \end{aligned} \quad (3-15)$$

其中

$NOP_{i,t}$ 為 i 公司第 t 期之營業外損益

$A_{i,t-1}$ 為 i 公司第 $t-1$ 期之總資產

EO 為期望值運算子

$NOP_{j,t}$ 為與 i 公司同產業 n 家公司之第 t 期之營業外損益， $j=1,2,3,\dots,n$,

但 $j \neq i$ 。

$UOP_{j,t}$ 為 i 公司第 t 期之異常營業外損益

四、研發支出

Perry and Grinaker(1994)以時間序列的方式，考慮總體與個別產業因素估計研發支出，以求得研發支出的被操縱部份。然而，有鑒於我國資本市場歷史較短，若使用時間序列的資料估計每家公司的預期研發支出時，會使樣本數不足致自由度過小，因此本文是參考金成隆(2000)使用橫斷面方式來估計預期的研發支出(URD)。計算式如(3-16)、(3-17)及(3-18)：

$$RD_{j,t} = \lambda_0 + \lambda_1 RD_{j,t-1} + \lambda_2 FUNDS_{j,t} + \lambda_3 CAP_{j,t} + \lambda_4 CHGGDP_t + \varepsilon_{j,t} \quad (3-16)$$

$$URD_{i,t} = RD_{i,t} - E(RD_{i,t}) \quad (3-17)$$

$$= RD_{i,t} - \left[\hat{\lambda}_0 + \hat{\lambda}_1 RD_{i,t-1} + \hat{\lambda}_2 FUNDS_{i,t} + \hat{\lambda}_3 CAP_{i,t} + \hat{\lambda}_4 CHGGDP_t \right] \quad (3-18)$$

其中

j 為與公司 i 同產業之公司

$RD_{j,t}$ 與 $RD_{j,t-1}$ 分別為 j 公司第 t 和 $t-1$ 年研發支出， $j \neq i$

$FUNDS_{j,t}$ 為 j 公司第 t 年扣除研發與折舊費用前之繼續經營部門盈餘，其為經常利益、研發、折舊之和

$CAP_{j,t}$ 為 j 公司第 t 年之資本支出，其為期末固定資產、折舊費用之和減去期初固定資產

$CHGGDP_t$ 為第 t 年經濟成長率（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

$RD_{i,t}$ 為 i 公司第 t 年研發支出

$E(RD_{i,t})$ 為 i 公司第 t 年預期研發支出

$URD_{i,t}$ 為 i 公司第 t 年可操縱之研發支出

以上變數均先以同年銷貨收入平減後，再進行衡量。

第五節 預期結果

本研究探討當公司獲利佳時（即有高盈餘或高課稅所得時），管理者是否會為了節稅的動機，透過盈餘管理降低公司的稅前所得，來達到節稅的效果；另若公司為了節稅的動機而進行盈餘管理時，究會使用何種工具來進行盈餘管理。故本研究的預期結果如下列幾點：

1. 當公司課稅所得高時，即未操縱盈餘的金額為正時，公司經理人可能利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來進行盈餘管理，使公司繳納最低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所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金額與未操縱盈餘的金額呈正比。
2. 當公司的課稅所得愈高時，公司所繳的所得稅愈多，所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可運用的金額愈大時，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費用則愈少；即可裁決性應計項目金額與營利事業所得稅費用呈反比。
3. 應計基礎的會計體系中有許多會計選擇，因此提供了經理人員自由裁決的空間與彈性，以達到降低盈餘的目的。所以當公司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理人可能使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降低盈餘。
4. 企業可透過外匯交易損益，利息收入或費用、出售投資損益等營業外損益來進行盈餘管理，所以公司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理人可能使用營業外損益降低盈餘。

5. 研發費用為一種可裁決性支出，對於研發費用支出比重較高的產業，公司經理人會使用研發費用做為操縱盈餘的工具。所以公司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理人可能使用研發費用降低盈餘。

第四章 實證結果

當公司營利所得增加時，即表示營利事業所得稅增加。而公司營利事業所得稅增加，公司經理人是否會透過盈餘管理來降低營利事業課稅所得，來達到節稅之效果，又公司經理人進行盈餘管理時，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來進行盈餘管理而達到節稅的目的，此為本研究探討的焦點。

經過資料的蒐集、分析及彙整，本章提出實證研究之結果。第一節為描述性統計量及相關性檢定；第二節為公司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理之迴歸分析；第三節為盈餘管理工具之分析；第四節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量及相關性檢定

本節先將 2001 年至 2006 年皆有盈餘的樣本資料做一基本描述性統計分析(表)，以了解其最大值、最小值、平均數、標準差等。此外，將應變數與自變數做相關性分析，以了解本研究實證模型中自變數之間的相關性，並進一步探討自變數間是否存在共線性，以便進行迴歸分析。

一、基本描述統計量分析

相較於一般探討盈餘管理之研究僅就盈餘管理程度進行分析，而本研究則保留其方向性的概念，意即經理人操縱盈餘的方向；一般探討盈餘管理之研究，皆著重於提高盈餘，而本研究著重於降低公司盈餘。本研究用以衡量管理當局盈餘管理行為的工具為「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及「個別裁決性應計項目」，當「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正且未操縱盈餘大於 0 時，表示公司經理人可能利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降低帳面盈餘；反之若為負值，表示公司經理人相對不可能利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降低帳面盈餘。

表 4-1 為實證模型中基本變數之描述統計值。由表中可發現可裁決性應計項目 (DAC) 之平均數為負數(-0.017069)，顯示就整體樣本公司而言，公司經理人會使用正的「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來降低帳面盈餘，但其餘的控制變數並未有顯著的差異，因此，營利事業所得稅對盈餘管理的影響需在控制所得稅費用率、未操縱前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率下，應以迴歸分析才能進一步分析。

表 4-1 各變數之描述統計值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i>DAC</i>	198	-0.7018	0.3900	-0.0171	0.1218
<i>TAX</i>	198	-0.0472	0.0953	0.0206	0.0208
<i>INBD</i>	198	-0.6221	0.7887	0.1528	0.1513
<i>SIZE</i>	198	11.5042	18.7780	15.1769	1.6598
<i>LEV</i>	198	0.0642	0.6030	0.4931	1.3319

註 *DAC*=裁決性應計項目；*INBD*=未操縱前盈餘；*TAX*=所得稅費用率；*SIZE*=公司規模；*LEV*=負債比率。

二、相關性分析

表 4-2 為各變數之 Pearson 相關係數矩陣。由表 4-2 可知，總裁決性應計項目與所得稅費用率是呈現負相關且達 1% 的顯著水準，顯示當總裁決性應計項目越高時，公司所繳納的所得稅越少；總裁決性應計項目與未操縱前盈餘是呈現正相關且達 1% 的顯著水準，顯示當總裁決性應計項目越高時，可操縱的盈餘越高；總裁決性應計項目與公司規模是呈現負相關且達 5% 的顯著水準，顯示公司規模越大，操縱盈餘的動機越小。

表 4-2 各變數 Pearson 相關係數矩陣

	<i>DAC</i>	<i>TAX</i>	<i>INBD</i>	<i>SIZE</i>	<i>LEV</i>	
Pearson 相關	<i>DAC</i>	1.000	-0.197	0.203	-0.120	-0.235
	<i>TAX</i>	-0.197	1.000	-0.078	-0.034	0.283
	<i>INBD</i>	0.203	-0.78	1.000	-0.023	-0.013
	<i>SIZE</i>	-0.120	-0.034	-0.023	1.000	0.014
	<i>LEV</i>	-0.235	0.283	-0.013	0.014	1.000
顯著性 (單尾)	<i>DAC</i>		0.003***	0.002***	0.046**	0.063*
	<i>TAX</i>	0.003***	.	0.137	0.319	0.000***
	<i>INBD</i>	0.002***	0.137	.	0.373	0.429
	<i>SIZE</i>	0.046**	0.319	0.373	.	0.423
	<i>LEV</i>	0.000***	0.000***	0.429	0.423	.

註 1.*DAC*=裁決性應計項目；*INBD*=未操縱前盈餘；*TAX*=所得稅費用率；*SIZE*=公司規模；*LEV*=負債比率。

註 2.***代表達 1%顯著水準；**代表達 5%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

三、共線性檢定

本研究使用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來進行檢定，當自變數有很大的 VIF 值時，即表示有嚴重的共線性。一般而言，當 VIF 值大於 10 時，則有共線之問題。表 4-3 即為各變數的變異數膨脹因素，表中自變數之 VIF 值皆小於 10，顯示迴歸模型中自變數之共線問題並不存在。

表 4-3 各變數的變異數膨脹因素

	VIF
所得稅費用 (<i>TAX</i>)	1.096
未操縱前盈餘 (<i>INBD</i>)	1.007
公司規模 (<i>SIZE</i>)	1.002
負債率 (<i>LEV</i>)	1.088

第二節 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理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高盈餘的公司為主，探討當公司課稅所得高時，經理人是否會基於節稅的動機，而利用可裁決性應計項目(Discretionary Accruals)的操控來進行盈餘管理。本研究將未操縱前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率納入控制變數，並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應變數，利用複迴歸分析來探討我國上市公司如何透過盈餘管理來達到預期營所稅節稅的目的，也就是探討所得稅政策如何的影響盈餘管理，相關實證模型如式(4-1)及實證結果列示於表 4-4。

實證模型：

$$DAC_{i,t} = \beta_0 + \beta_1 TAX_{i,t} + \beta_2 INBD_{i,t} + \beta_3 SIZE_{i,t-1} + \beta_4 LEV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4-1)$$

表 4-4 所得稅政策與盈餘管理行為迴歸實證結果

自變數	係數估計值	預期符號	P 值	t 值	F 值	Adj.R ²
所得稅費用率 (<i>TAX</i>)	-0.771	-	0.063*	-1.868	6.793***	22.3%
未操縱前盈餘 (<i>INBD</i>)	0.151	+	0.006***	2.766		
公司規模 (<i>SIZE</i>)	-0.009	-	0.084*	-1.737		
負債比率 (<i>LEV</i>)	-0.018	+	0.006***	-2.753		

註 1. 依變數：可裁決性應計項目 (*DAC*)。

註 2. ***代表達 1%顯著水準; *代表達 10%顯著水準。

F 檢定表示模式顯著性整體考驗，由表 4-4 可知實證模型(4-1)樣本之迴歸結果，F 檢定達 1%顯著水準，據統計上的顯著性，顯示自變數整體而言具有解釋因變數的能力。調整後判定係數(Adj.R²) 顯示自變數的整體解釋力，代表迴歸模型可解釋變異量。因此所得稅費用率對可裁決應計項目的解釋能力有 22.3%。

由表 4-4 中可歸納出本研究的代理變數「所得稅費用率」(*TAX*)，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負相關(係數估計值=-0.771，t 值=-1.868，p 值=0.063)，此結果支持了本研究之假說二(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金額與所得稅費用呈反比)；未操縱前盈餘(*INBD*)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正相關(係數估計值=0.151，p 值=0.006)，且達 1% 之顯著水準，此結果支持了本研究之假說一；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金額與未操縱盈餘呈正比。

公司規模(*SIZE*)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負相關(係數估計值=-0.009，t 值=-1.737，p 值=0.084)，顯示當公司規模越大，公司經理人盈餘管理程度較高，與本研究預期結果相符。根據政治成本理論發展而來的規模假說，大規模的公司易成為外界矚目的焦點，而受反托拉斯法的調查，所以大規模公司所面臨的政治成本較高，降低盈餘的程度也較高；負債比率(*LEV*)，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負相關(係數估計值=-0.18，t 值=-2.753，p 值=0.006)，且達 1% 之顯著水準，顯示當公司負債比率越大，公司經理人盈餘管理程度較低(節稅動機較小)，與本研究預期結果不一致；造成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這些負債比率較高的公司，其財務狀況已不甚健全，發生財務危機的可能性較高，也因此較易受到主管機關的關切，故負債比率較高的公司無法透過裁決性應計項目來進行盈餘管理。

第三節 盈餘管理工具之分析

本研究企圖探討盈餘管理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是否有關聯性，由上一節的實證結果說明了盈餘管理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是有關聯性的，而盈餘管理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既有關聯，公司經理人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來進行盈餘管理而達到節稅的目的，此為本節研究探討的焦點。

本節將以迴歸模式之實證結果來分析，當公司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公司經理人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來進行盈餘管理而達到節稅的目的。本研究以 t 檢定及無母數 z 檢定來測試項目之平均數，在各種可能的操縱工具上，操縱組與對照組是否有顯著的差異。相關之實證結果列示於表 4-5。

一、檢定結果分析

表 4-5 為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之公司檢定的結果，由表中呈現結果如下：

表 4-5 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平均數檢定結果

測試項目	操縱組 平均數	對照組 平均數	兩組均數差	統計量 (t)	
				有母數檢定	無母數檢定
<i>DAC</i> 總裁決性應計項目	-0.0272	0.2272	-0.2544	0.835*	-1.916***
<i>DAR</i> 可裁決性應收帳款	0.0016	-0.0081	0.0097	0.480	0.659
<i>DAI</i> 可裁決性存貨	0.0310	0.0118	0.0192	1.317	0.071*
<i>DAP</i> 可裁決性應付票據	0.0033	-0.0164	0.0607	1.224*	0.819
<i>UNOP</i> 可裁決營業外損益	-0.0278	0.0513	-0.0791	-3.161***	-6.382***
<i>URD</i> 可裁決研發支出	0.0052	0.0159	0.0211	-3.271***	-1.916***

***代表達 1%顯著水準;*代表達 10%顯著水準。

(一) 裁決性應計項目

實證結果顯示，當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操縱組)相對於未操縱前盈餘小於 0 時(對照組)，公司經理人會進行盈餘管理。由表 4-5 中可看出，總裁決性應計項目(*DAC*)，操縱組的平均分數為-0.0272，低於對照組的平均分數 0.2272，且不論有母數檢定或無

母數檢定皆達 1%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經理人發現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可能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來降低盈餘。

在個別裁決性應計項目方面，裁決性應收帳款(*UAR*)不論有母數檢定或無母數檢定皆未達顯著水準。理論上，操縱組的平均數應小於對照組平均數且操縱組平均數與對照組平均數皆大於 0。但本研究操縱組的平均數大於對照組平均數，而對照組平均數卻小於 0，有可能是迴歸式在估計公司正常值時產生的誤差所致。

在裁決性存貨(*UI*)方面，操縱組的平均分數為 0.0310，低於對照組的平均分數 0.0118，兩組均差為 0.0192，且無母數檢定皆達 10%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經理人可能藉由增加存貨來降低盈餘。

在裁決性應付票據(*UAP*)方面，操縱組的平均分數為 0.0033，高於對照組的平均分數 -0.0164，兩組均差為 0.0607，且有母數檢定皆達 10%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經理人會藉由增加應付票據來降低盈餘。

(二) 可裁決營業外損益

在可裁決營業外損益(*UNOP*)方面，操縱組的平均分數為 -0.0278，低於對照組的平均分數 0.0513，兩組均差為 -0.0791，且不論有母數檢定或無母數檢定皆達 1%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經理人可能藉由降低營業外損益來降低盈餘。

(三) 可裁決研發支出

在可裁決研發支出(*URD*)方面，操縱組的平均分數為 0.0052，高於對照組的平均分數 -0.0159，兩組均差為 0.0211，且有母數檢定皆達 10%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經理人會藉由增加公司研究發展費用來降低盈餘。

綜合以上實證結果，說明了盈餘管理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是具有關聯性(呈現負相關)，且未操縱前盈餘 (*INBD*)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正相關，皆達 1%之顯著水準，此結果支持了本研究之假說一及假說二。又公司規模(*SIZE*)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負相關，顯示當公司規模越大，公司經理人盈餘管理程度較高，與本研究預期結果相符；負債比率(*LEV*)，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負相關顯示當公司負債比率越大，公司經理人盈餘管理程度較低(節稅動機較低)，與本研究預期結果不一致。

在盈餘管理工具方面，本文進一步研究當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公司經理人較常透過那些工具來進行盈餘管理。實證結果顯示，裁決性存貨(*UI*)、裁決性應付票據(*UAP*)、異常營業外損益(*UNOP*)及異常研發支出(*URD*)較常為公司經理人使用。

第四節 本章小結

茲將本研究之實證結果歸納如下，並彙總於表 4-6。

一、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關聯性

根據實證結果發現：

(一) 所得稅費用率(所得稅政策之替代變數)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顯著負相關，且係數估計值達-0.771，顯示公司經理人會為了節稅的動機進行盈餘管理，此結果支持了本研究之假說二。(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金額與所得稅費用率呈反比)

(二) 未操縱前盈餘 (*INBD*)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正相關，且達 1%之顯著水準，此結果支持了本研究之假說一(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金額與未操縱盈餘呈正比)。

二、盈餘管理工具之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當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操縱組相對於未操縱前盈餘小於 0 時對照組，公司經理人會進行盈餘管理，而實證結果總裁決性應計項目 (*DAC*) 不論有母數檢定或無母數檢定皆達 1% 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管理當局發現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會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來降低盈餘，進而降低盈餘。

1. 個別裁決性應計項目

(1) 裁決性應收帳款 (*UAR*) 方面

裁決性應收帳款不論有母數檢定或無母數檢定皆未達顯著水準，有可能是迴歸式在估計公司之正常值時產生的誤差所致。

(2) 在裁決性存貨 (*UI*) 方面

裁決性存貨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負相關，均數差為 0.0192，且無母數檢定達 10% 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經理人會藉由減少存貨來降低盈餘。

(3) 在裁決性應付票據 (*UAP*) 方面

裁決性應付票據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正相關，均數差為 0.0607，顯示公司經理人會藉由增加應付票據來降低盈餘。

2. 可裁決營業外損益方面

在異常營業外損益 (*UNOP*) 方面，異常營業外損益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負相關，均數差為 0.0791，且不論有母數檢定或無母數檢定皆達 1% 之顯著水準。顯示公司經理人會藉由降低營業外損益來降低盈餘。

3. 可裁決研發支出

在可裁決研發支出 (*URD*) 方面，均數差為 0.0211，實證結果顯示公司經理人會藉由增加公司研究發展費用來降低盈餘。

綜上，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有關聯性的，當管理者在進行盈餘管理時，裁決性存貨（*UI*）、裁決性應付票據（*UAP*）、異常營業外損益（*UNOP*）及異常研發支出（*URD*）較可能為公司經理人使用。而盈餘管理的程度經實證結果依序為異常營業外損益、裁決性應付票據、異常研發支出及裁決性存貨。（參見表 4-6）

表 4-6 實證結果彙總表

研究假說	檢定結果
H1：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金額與公司未操縱盈餘呈正比	假說獲得支持
H2：可裁決性應計項目之金額與所得稅費用呈反比	假說獲得支持
H3：公司若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理人可能使用可裁決性項目降低盈餘。	假說獲得支持
H4：公司若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理人可能使用營業外損益降低盈餘。	假說獲得支持
H5：公司若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理人可能使用研發費用降低盈餘。	假說獲得支持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關聯性之研究，目的在瞭解，公司經營者在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是否會為了節稅的動機，而透過盈餘管理降低公司的稅前純益，並進一步探討當管理當局在進行盈餘管理時，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來進行盈餘管理，而達到節稅的目的。

本研究針對 2001 年至 2006 年皆有高盈餘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並採用 Modified Jones model 來估計裁決性應計項目。從過去與盈餘管理有關之文獻可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未操前盈餘、公司規模及負債比率等，為避免實證結果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而產生偏差，本研究將之納入控制變數，並以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為應變數，利用複迴歸分析來探討我國上市公司如何透過盈餘管理來達到預期營所稅政策的目的，也就是探討營所稅政策如何的影響盈餘管理。

另本研究進一步探討當管理當局在進行盈餘管理時，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來進行盈餘管理。在假說三至假說五部份（公司若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理人可能使用可裁決性項目、營業外損益及研發費用降低盈餘。），本研究將樣本分成操縱組及對照組，以有母數檢定及無母數來檢定操縱組及對照組之平均數是否顯著差異，目的在瞭解，公司經營者在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是否會為了節稅的動機，而透過盈餘管理降低公司的稅前純益，並進一步探討當管理當局在進行盈餘管理時，究竟會使用何種工具來進行盈餘管理，以檢定假說三至假說五。（公司若課稅所得愈高，則公司經理人可能使用可裁決性項目、營業外損益及研發費用降低盈餘。）茲將本研究之實證結果歸納如下：

一、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具有關聯性

根據實證結果發現，所得稅費用率(所得稅政策之替代變數)與可裁決性應計項目呈現顯著負相關，且係數估計值達-0.771，實證結果顯示公司經理人會為稅務之目的進行盈餘管理。當公司有高盈餘時，公司經理人會為了節稅的動機而操縱盈餘以降低公司課稅所得。

二、盈餘管理工具之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當未操縱前盈餘大於0時(操縱組)相對於未操縱前盈餘小於0時(對照組)，公司經理人會進行盈餘管理，而當公司經理人進行盈餘管理時，會使用裁決性應計項目(裁決性存貨、裁決性應付票據)、可裁決營業外損益(*UNOP*)及可裁決研發支出(*URD*)來降低盈餘，進而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

三、就稅務的觀點而言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既有關聯性，那麼就稅務的觀點而言，當政府在訂定相關租稅法規時，是否應考慮公司經理人的盈餘管理：

(一) 就財政收入而言：

- 1.將裁決性存貨及裁決性應付票據的迴轉控制在一定的數額。
- 2.在異常營業外損益項目方面：目前營利事業所得稅規定在5年內，損失與盈餘可以互抵。公司經理人通常會將損失後第5年(損失後第6年即不可扣抵。)的盈餘大量沖抵，而使政府稅收大受影響，因此政府在訂定租稅法規時可限定給予每年一定數額沖抵。
- 3.在異常研發支出方面：為避免公司經理人藉研發支出操縱盈餘，政府在訂定相關租稅法規時，應對不同產業分別訂定公司每年研發支出的標準。

(二) 就社會公平而言：有所得即應繳稅，且越高所得者應負擔更多的稅賦，所以

政府在訂定租稅法規時，對於高盈餘的公司應考慮管理者的盈餘管理，對於可裁決性應計項目、異常營業外損益項目及異常研發支出方面應訂定一定限額，以維護租稅公平。

四、就公司管理者觀點而言：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既有關聯性，那麼就管理者的觀點而言，當公司有高盈餘時，公司經理人基於節稅的動機而進行盈餘管理：

(一) 就效率而言：公司經理人使用的盈餘管理工具依序為異常營業外損益、裁決性應付票據、異常研發支出及裁決性存貨。

(二) 考慮會計迴轉而言：公司經理人使用的盈餘管理工具依序為裁決性應付票據、裁決性存貨、異常營業外損益及異常研發支出。

綜合以上研究，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是有關聯性的，當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公司經理人會進行盈餘管理，以降低公司盈餘，達到節稅的效果；當管理當局在進行盈餘管理時，裁決性存貨 (UI)、裁決性應付票據 (UAP)、異常營業外損益 (UNOP) 及異常研發支出 (URD) 較可能為公司經理人使用。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針對 2001 年至 2006 年高盈餘 (2001 年至 2006 每年皆有盈餘且現金股利每年皆大於 \$1) 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雖獲得良好的研究結果，但仍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嚐試以下深入的探討：

1. 本研究高盈餘的假設(連續 5 年未虧損，現金股利發放大於 1 元)及企業未操縱前盈餘大於 0 時，公司經理人會進行盈餘管理以降低公司盈餘，達到節稅效果的假設，

在實務上可能不夠完整，後續學者可嘗試運用不同的盈餘假設如：員工分紅情形、每股盈餘、息稅前盈餘等……進行研究。

2. 公司經理人進行盈餘管理時，降低公司盈餘並不完全為節稅的動機，可能還有其他的因素（例如：為了來年的盈餘績效、避免成為社會的焦點等...）後續研究可考慮其他影響因素再做探討。
3. 本研究以國內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探討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盈餘管理是有關聯性，研究樣本未包括上櫃公司，因此本研究結果能否推論至上櫃公司，可進一步評估。
4. 可能還有其他影響公司管理當局進行盈餘管理因子，例如公司資金的融通能力不易衡量，故本研究未加入探討，後續研究可加入探討。
5. 本研究因受高盈餘的假設致樣本數過少故未考慮各產業盈餘管理工具的差異性，例如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的製造費用、電子業與非電子業的研發費用或資本密集與非資本密集的固定費用，後續研究可加入探討。
6. 本研究僅考慮折舊性資產總額，未考慮公司經理人是否會運用不同的折舊方法操縱盈餘，建議後續研究可加入探討。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 王宏文(2000),「地雷股盈餘管理行為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脩斐(1996),「盈餘管理偵測模型之評估」,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江向才及鄭莉(2003),「盈餘管理與償債能力之關係—以台灣上市公司資訊電子業為例」,長榮大學學報,第七卷第一期,1-25頁。
- 巫鑫(1998),「兩稅合一制下緩課股票股利稅務規劃須知」,會計研究月刊,第156期,80-89頁。
- 李建然及羅元銘(2002),「新上市公司上市後營運績效衰退原因之探討」,財務金融學刊,第十卷第一期,23-52頁。
- 李儒哲(1999),「我國企業盈餘管理手法之研究」,稅務研究月刊88期專題。
- 沈維民(1997),「探討企業如何透過會計方法選用和應計項目認列以達成盈餘管理之目的」,管理評論,第十六卷第一期,11-37頁。
- 林世銘、林宗輝及蔡彥卿,(2001),「兩稅合一與盈餘管理」,第十屆會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中華民國台北。
- 林明璋(1997),「我國上市公司盈餘管理之研究」,元智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嬋娟、洪櫻芬及薛敏正(1997),「財務困難公司之盈餘管理實證研究」,管理學報,第十四卷第一期,15-38頁。
- 林嬋娟及官心怡(1996),「經理人員盈餘預測與盈餘操縱之關聯性研究」,管理與系統,第三卷第一期,27-41頁。
- 林嬋娟及林圀成(2003),「電子產業之盈餘管理行為與資訊內涵研究」,現代財務論壇學術研討會出版品。
- 邱淑萍(2003),「盈餘衰退公司盈餘管理決策行為之探討」,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及科技研究所。

- 金成隆、林修葳及林憶樺(2000),「台灣上市電子公司研究發展費用與強制性盈餘預測關聯性之實證研究」,管理學報,第七卷第一期,713-740頁。
- 胡永純(1997),「盈餘預測與盈餘管理之關聯性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會計學系碩士論文。
- 馬嘉應及劉敬業(2000),「企業合併之會計及稅務問題探討」,財稅研究,第三十二卷,第一期,67-79頁。
- 郭伯疆(1995),「強制性財務預測修正決策與盈餘管理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怡君(2003),「財務危機公司盈餘管理方式之研究」,中原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亭如(2000),「兩稅合一下營利事業所得稅與股票報酬關聯性之實證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曾國揚(1994),「上市後業績衰退與盈餘管理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馮志卿(1998),「營運活動現金流量、應計項目與業外損益的盈餘持續性及市場效率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惠君(1995),「公司上市前後盈餘操縱與上市後盈餘績效及盈餘操縱動機之關聯性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會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中航(2004),「中小企業盈餘管理型態與操作工具之研究」,淡江大學會計學系碩士論文。
- 楊朝旭及吳幸蓁(2002),「總經理薪酬績效敏感性、績效門檻與盈餘管理關聯性之研究」,會計評論,第三十六卷,55-87頁。
- 管夢欣(1993),「長期性資產出售交易與盈餘管理行為之關聯性實証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 歐進士、李佳玲及詹茂昆(2004),「我國企業盈餘管理與經營風險關聯之實證研究」,風險管理學報,第六卷 第二期,181-206頁。

鄭丁旺(1993),「中級會計學第五版」,三民書局,中華民國台北,13-15頁。

蕭信義(2002),「業績衰退公司盈餘管理之研究—以上市公司為例」,國立成功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慧芬(1992),「上市公司上市前後盈餘窗飾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西文部份

Aharony, J., C. J. Lin and M. Loeb(1993),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accounting choice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Vol.10(Fall), pp.61-82.

Bartov, E.(1993), "The Timing of Asset Sales and Earnings Manipulation,"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68, No.2(October), pp.840-855.

Berger, P. G.(1993), "Explicit and implicit tax effect of the R&D tax credit,"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31, No.2(Autumn), pp.131-171.

Bushee, B.(1998),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 investor as a corporate monitor,"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73, No.3, pp.305-333.

Cahan, S. F.(1992), "The effect of antitrust investigations on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 refined test of the political-cost hypothesis,"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67, pp.77-95.

DeAngelo, H. L., DeAngelo and D. J. Skinner(1994), "Accounting Choice in Troubled Compani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 Vol.17, pp.113-143.

Dechow, P. and R. Sloan (1991), "Executive Incentives and the Horizon Problem: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14(1), pp.51-89.

Dechow, P. M., R. G. Sloan and A. P. Sweeney(1995),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70, No.2(April), pp.193-225.

DeFond, M. L. and J. Jiambalvo (1994), "Debt covenant viol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accrual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 Vol.17, pp.145-176.

Don Herrmann and Tatsuo Inoue(2003), "The Sale of Assets to Manage Earnings in Japan,"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41, No.1(March), pp.89-107.

- Friedlan, J. M. (1994), "Accounting Choice by Issuers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Vol.11, pp.1-13.
- Gordon, M.J.(1963), "Optimal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Policy," *Journal of Finance*, Vol.18, pp.264-272.
- Gramlich, J.(1991), "The Effect of the Alternative Minimum Tax Book Income Adjustment on Accrual Decis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Vol.13, pp.36-56.
- Guenter, D. A. (1994), "Earnings management in response to corporate tax rate changes: Evidence from the Tax Reform Act 1986,"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69, pp.230-243.
- Healy, P.(1985), "The Effect of Bonus Schemes on Accounting Decis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7(April), pp.85-107.
- Healy, P. and J.Wahlen(1999),"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andard setting," *Accounting Horizons*, Vol.13, pp.365-383.
- Jiambalvo, James, S. Rajgopal and M. Venkatachalam(2002),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stock prices reflect future earning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Vol.19, No.1(Spring), pp.117-145.
- Jones, J.(1991), "Earning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29, No.2(Autumn), pp.193-228.
- Klassen, K., M. Lang and M. Wolfson(1993), "Geographic income shifting b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response to tax rate chang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31 (Supplement), pp.141-173.
- Lopez, Regier and Lee (1998), "Identifying tax-induced earnings management around TRA 86 as a function of prior tax-aggressive behavior," *Japan Association of Travel Agents*, pp.37-56.
- Michael Porter(1992),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 *Free Press*, pp.121.

- Perry S. and R. Grinaker(1994), "Earnings Expectations and Discretion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ending," *Accounting Horizons*, Vol.8, No.4(December), pp.43-51.
- Porter, Michael E.(2001), "Strategy and the Interne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 pp.63-78.
- Schipper, K.(1989), "Commentary on Earnings Management," *Accounting Horizons*, Vol.3, pp.91-102.
- Scholes, M. S., G. P. Wilson and M. A. Wolfson(1992), " Firms' responses to anticipated reductions in tax rates: The Tax Reform Act of 1986,"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Supplement)*, pp.161-185.
- Stober G, A. Heils and K.P. Lesch(1993),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polymorphism and affective disorder Lancet,"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Vol.47, pp.340-341.
- Teoh, S. H., Ivo Welch and T. J. Wong(1998),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the long-run market performance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Journal of Finance*, Vol.6, pp.1935-1974.
- Wang, M.Y., A.D.M. Glass, J.E. Shaff and L.V. Kochian(1994), "Ammonium uptake by rice roots III ," *Electrophysiology Plant Physiol*, Vol.104, pp.899-906.
- Watts, L. W. and J. L. Zimmerman(1978), "Towards a Positive The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Standards," *The Accounting Review*, Vol.8, pp.112-134.